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王国玉

南次郎1873年生于日本大分。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曾以少尉军衔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后入陆军大学，1903年毕业于，参加日俄战争，任骑兵中队长围攻旅顺。不久转调大本营为陆军幕僚，其后历任陆军大学兵学教官、关东都督府参谋、陆军骑兵学校教官、骑兵第十三联队长、军务局骑兵课长、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骑兵第三旅团长、骑兵学校校长、骑兵第十六师团长。1927年3月，任参谋本部次长。1929年8月任朝鲜军司令官，翌年3月晋升为大将，12月任军事参议官。1931年4月滨口内阁辞职，若槻礼次郎内阁成立，南次郎任陆相，币原喜重郎任外相。

币原在1930年任滨口内阁外相时，缔结华盛顿裁军条约，增加了日本陆海军内部的愤怒，攻击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陆海军试图确保军方对政府完全支配权的活动日见频繁。南次郎和青年军官、军队中坚阶层有广泛的联系，关系密切。他与于1930年9月在陆海军中结成的樱会有密切的关系。樱会集团企图策划政变，进行所谓国内革新和解决满洲问题，建立军部独裁内阁。

1930年下半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确定了日本分离中国，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三种方案：一、建立在中国中央政权下的满蒙亲日政权；二、建立脱离中国的满蒙独立国；三、占领满蒙成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

南次郎充任若槻内阁陆相不久，就赞不绝口地说：“《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很好，我完全同意，可以大干一场嘛！”于是，在南次郎的策划下日本军部秘密指派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成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在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6月19日拟定《对满蒙方策》，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定稿为《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6月末，陆军省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来东京，把这个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

8月3—4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召开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第一天，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在参谋本部作了军制改革的报告，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朝鲜司令官林銑十郎等特别要求必须精读《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准确无误地领会精神实质，恰当地适时应变。

第二天，陆相南次郎在陆军省训示军司令官、师团长说：“近来某些局外不负具体责任的人，或对于国防缺乏关心的人，认为军都不了解国家现状竟提出不当要求。他们鼓吹裁减军备，宣传对国家、国军不利的言论。希望到会人员对此等谬论大力予以驳斥、纠正。”所说的局外人显然是指外省省。

南次郎在这次会议上还就所谓满蒙问题赤裸裸地发出了战争叫嚣。他说：“满蒙之地，无论在国防上、政治上、经济上，对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最近该方面情势有使帝国甚为不满之倾向，且有日趋严重之感，诚属遗憾。这对于帝国与其说是向坏的趋势发展，勿宁说是使人感到事态严重，危机四伏。益导致此等情势之原因，或由于国际政局变化，以及我国民萎靡不振，致使对外国威衰退；或由于邻邦长期宣

传培养恢复国权之排外思想，以及其新兴经济力量之向满蒙发展等。有此根源，决非暂时现象，必须承认其长期之存在。当此时机，鉴于当前满蒙事态的严重化，凡属军职人员，应当更加竭诚奉公，热心教育训练，克尽职责，勿稍疏虞，为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必要时，断然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都应在所不惜，是所至盼。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亦要改变这种绝对不能容忍的现状。”南次郎的讲话，无异是在公然叫喊要发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

南次郎的训示讲话，引起强烈的反响。8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谴责南次郎做政治演说是超越职权的行为。民政党也抓住这个问题抨击陆军。但是，民政党总裁、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并不想把事情弄大，他不准备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提交内阁会议，而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8月5日的内阁会议开会之前，他召见币原外相嘱托说：“作为外务省，对于南陆相这类攻击外交的演说，当然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请你不要就那些问题对陆相说什么……。”

币原听了若槻的劝告，他自作解释地说：“既然话已经说出来了，就不好收回了，况且纠缠那些问题，于政局方面也不妙。”而在内阁会议上他仅提醒南次郎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陆相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的训示内容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多钟，关东军在沈阳郊外东北军北大营附近，炸毁满铁铁道，制造柳条沟事件，反诬东北军所为，发动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后，若槻内阁于19日上午10时召开紧急临时内阁会议。在内阁会议上南次郎按照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人在陆军中央部会议上编造的谎言说：“对于中国奉天正规军四五百人爆破我柳

条沟附近南满铁路，向我铁道守备队开枪发炮，关东军被迫还击迎战，应理解为是完全适当的自卫行动，是恰当地行使统帅权……”

南次郎的发言遭到外相币原喜重郎等人的反驳。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未敢按陆军原定意见提出从日本国内和朝鲜派兵增援关东军的议案。这次内阁会议最后还决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要求关东军恢复原状，责成陆军省训令关东军遵照执行。事实上币原等内阁成员，并不反对侵略中国东北，只是在侵略东北的手段上主张缓进，反对急进，怕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而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可是内阁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防止事态的扩大，而且也没有追查陆军的阴谋。

事后，陆相南次郎虽然也向关东军及朝鲜军发出电报，但电报中却肯定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适合机宜的”“增加了日本军队的威严”。同时关东军及朝鲜军则复电表示不满和不执行阁议。9月20日，南次郎则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召开了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不执行内阁决议，支持关东军及朝鲜军不断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为此陆军请天皇裕仁向内阁提出妥协方案，使内阁于9月25日通过了拨款给关东军作为其侵占东北活动的经费，并由天皇裕仁签署了朝鲜军过界进入满洲的命令。9月28日，三长官又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等人到沈阳，向关东军司令部传达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指示，说：“不扩大事态，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至于进入军事上，用兵上必要的地点，应另有考虑。”“不扩大事态并不妨碍关东军在军事上向所需要占据的地点扩张。”同时，陆相南次郎本身则日复一日地向首相若槻礼次郎施加压力，他曾向首相报告说：“由于战略上的理由，关东军在一定距离的中国领域内有追击中国军队之必要。因

为这是一种保护手段，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也不能看做是事态扩大或恶化……”不多日后他又向若槻报告说：“战区虽然又扩大了，但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无论如何也不能看做是事态的扩大或恶化。内阁的决策，亦即被天皇陛下称之为适当的决策，是不使事态恶化和不扩大事态的决策。我现在完全理解了，不使事态恶化或扩大并不等于说不扩大战区……”

与此同时，关东军威胁日本政府，如妨碍或不支持军部和关东军的行动，关东军将脱离日本政府而独立，自己统治满洲。

此后，若槻内阁首相迫于军部和十月未遂政变的压力，不得已于12月13日宣布内阁总辞职。南次郎则转任军事参事官，继续从事侵略中国东北分离东北的活动。12月末，他只身来到沈阳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会晤研究侵占东北的对策，并先后会晤伪奉天省长臧式毅和伪吉林省长官熙洽。

南次郎向熙洽说，这次来满洲，是专门为和满洲当局商讨如何结束目前满洲的混乱局面，希望满洲当局能够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对此，日本政府拟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在满洲建立特殊行政权，统一新局面；另一个是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迎接溥仪来满洲建立满蒙独立国。日本政府没有成见，任凭满洲当局自由选择，但是两者之中必行其一。他还说，在奉天曾和臧式毅会谈，臧式毅不肯表明意见，只说愿意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两个方案听从吉林选择，他坚决和吉林合作，采取一致行动。臧式毅既然对你们吉林是这样信任，那你们就必须明白表示自己真正的主张，不使臧氏失望。

熙洽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政府拟定的第二个方案，迎接宣统皇帝溥仪来东北。他还表示同意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满蒙独立国，但是顾虑国际上是否会加以干涉，并且溥仪是否会来东北。南次郎则说，任何国际间的干涉都由日本政府来负责；

迎溥仪来满洲的一切筹划工作，日本方面都会安排妥当，这两点都不必有任何顾虑。

南次郎很满意地回到沈阳，与关东军加紧策划早日建立伪国家，终于在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国。

1934年12月至1936年3月南次郎来满，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向日本政府和军部呈上一份《关于贯彻对满政策的意见》，此意见书共分方针、要领两大款，在要领部分又分“对满政策”与“对满洲国的指导”两大项。在“对满政策”大项中，又包括了“指导精神”、“机构的管理与统制”、“治外法权的废除”、“附属地行政的调整”、“改组满铁”、“解决北铁”、“日满经济会议的建立”、“日满关税”、“移民”、“对满文化事业”等10个问题。在“对满洲国的指导”大项中又包括了“尊重独立”、“指导中枢”、“满洲国官吏”、“国籍”、“宪法”、“民意畅达”、“行政组织及其运用”、“军警统制”、“经济”、“币制”、“教化”、“监察院”等13个问题。

这个意见书，较之以前日本政府、军部及关东军所制定的各种对满方针、政策更为具体与露骨，其中特别强调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反复强调了日本人对伪满的领导地位。书中曾提出，“对满洲国的指导”，应“依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内部指导，由日系重要官吏特别是总务厅与军的首脑部一体同心予以执行”，“应绝对排斥不经过关东军对满指导的行动”而不给伪满以丝毫的“自主权”、“应使皇国的威力经常保持潜在的动势，不给高判阴谋以可乘之机”。

第二，强调日本军、政、民各界同中央施策保持一致。即“以军方为中枢，实行一元化管理”，以便更好地驾驭伪满政权，残酷统治东北各族人民。

第三，强调对伪满的统制指导。包括经济、行政改革、外交、文化事业，及满铁改组、关税、币制等许多方面。都要由日本人予以“指导”与统制。

总之，南次郎的意见书，使日本对伪满的统治更加系统化与具体化了。南次郎到任后，则积极执行这一具体化的统治政策，突出的事情是对伪国务总理大臣进行了调整，对伪机构进行了改组。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在伪满洲国成立后仍然不甘心放弃复辟大清的打算，并表露于言行，深为南次郎恼怒。早在1932年5月，国际联盟调查团来东北的时候，与郑孝胥会晤。郑孝胥曾大谈“门户开放”、“利益均等”、“国际共管”，颇为调查团重视，对此南次郎曾记忆犹新。这次郑孝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由内阁行使，提出一切政务须由国务会议决定，然后由总理大臣把议案呈皇上裁可。这更直接违反了南次郎的意见书所规定的内容。南次郎等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然不能容许他如此的异想天开，于是南次郎决定一脚踢开这个曾亦步亦趋地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而现在又不驯服的伪国务总理大臣。据溥仪回忆，当时南次郎曾在一次与他会见时提出“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溥仪表示同意，提出让臧式毅继任，南次郎则摇头说：“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①。结果，于1935年5月，罢免了郑孝胥的总理大臣职务，任命张景惠当了伪国务总理大臣，同时还将念念不忘复辟清朝的熙洽免去财政部大臣职务，改任宫内府大臣的闲职。

在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南次郎还在军事方面调兵遣将，对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44页。

我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大举讨伐，对爱国民众实行血腥镇压，制造白色恐怖，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当时，日伪军以东边道、三角地带（安东、凤城、岫岩等地区）、奉吉地区、吉林省等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讨伐，杀害了许多抗日武装的官兵及民众，其中，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就是在这一时期遇害的。据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编制的《最近满洲国的治安》刊载，在南次郎到职前的1934年11月，东北抗日武装人员为32 000人，到1936年2月南次郎去职前减少到15 000人。

南次郎在对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实行军事讨伐的同时，还调动宪兵、特务、警察对民众实行血腥的白色恐怖。当时沈阳盛京施医院、文华中学、第一师范部分大夫、师生和教会牧师给文华中学学生钱福荣募集学膳费，每人每天省一分钱帮助家贫的钱福荣坚持学习下去，被日本宪兵队疑为是共产党组织，定为“一分委员会”进行镇压。1935年10月12日晨逮捕了牛光甫、刘国华、钱福荣等58人，后来又捕了一些人。结果被活埋1人，死于狱中和出狱后即死亡的3人，被判刑的5人。诸如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1936年4月，南次郎被编入预备役，退出军职。同年8月至1942年5月转任朝鲜总督。后又任日本枢密顾问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等职。1945年日本战败后，南次郎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派兵逮捕，关入狱中。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战犯判处无期徒刑。